「改革開放」前彭真與鄧小平政治關係之研究（1938~1976）*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關於中共早期政治要人彭真和鄧小平之間的政治關係問題，無論是中國大陸或是海外學界都未曾對之進行專門研究和深度考察，僅有淺薄、甚至含有偏差認識的簡單論述。本文對彭真、鄧小平早年政治關係梳理和重建如下：彭真、鄧小平都是毛澤東喜愛並予器重的所謂「國王人馬」，兩人皆信從毛澤東而看似合作無間，實則存有隱而不顯的微妙競爭；這可能也與毛澤東的政治操作有關。彭真在 1940 年代前半期協助毛澤東推展延安整風而躋身中央高層；鄧小平立有戰功和歷經黨內鬥爭後，1950 年代中期躍升中央核心，權位反居彭真之前。1956 年起，鄧小平獲命領導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貫徹中央決策、管理黨日常工作，進而監管政府工作；鄧小平讓副手彭真承擔書記處的實際工作，後者足堪重任，同時也擅使重權。1960 年代初，在與毛澤東保持立場一致的問題上，彭真略勝鄧小平一籌；1964 年底毛澤東批評鄧小平「搞獨立王國」後約略一年的時間，他甚至有親彭疏鄧的意向和跡象。彭真政治氣勢如虹之際，迅速陷入爭論漩渦，反而垮台在鄧小平之前。

關鍵詞：彭真、鄧小平、中央書記處、中共黨史

*　*　*

壹、前　言

彭眞（1902~1997）和鄧小平（1904~1997）是橫跨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重要領

* 作者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研究員，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曾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5-2628-H-004-006-MY2）。

DOI：10.30389/MCS.201803_61（1）.0001

導人。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兩人年紀較輕，「文化大革命」以前長期受到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重用，共同擔負黨國重要的領導工作；在「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爲最高的掌權者，彭眞也位居以鄧爲首的「八大元老」之列。

關於彭眞與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中的政治互動和關係問題，囿於篇幅，本文主要聚焦「文革」結束以前。針對此一研究議題，中共官方編寫的《彭眞傳》和《鄧小平傳》沒有特別對之爬梳和專門討論，而是零散敘及。這是中共官方人物傳記「各爲其主」的寫作習慣和呈現方式的緣故。中國大陸目前僅有的專論鄧小平、彭眞之間政治往來的文章，側重介紹他們在 1960 年代初期經濟調整期間如何觀點一致、攜手並肩（宋毅軍 2014, 21-24），完全不見這一階段他倆之間實際存在不小的政見差異。

海外關於彭眞、鄧小平以至中共歷史和政治的著作，對於他們的關係演變和工作互動問題，也未曾有過全面討論和深度研究。當觸及有關問題時往往甚爲簡略，例如：「文革」前鄧小平領導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時特別倚賴彭眞一事，雖然經常被論者提到，但是每每欠缺詳情和細節（鍾延麟 2013, 42-43; Potter 2003, 83）。另外，相關研究文獻甚至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先簡化地將彭眞、鄧小平各自看作是分屬劉少奇、毛澤東的政治人馬；然後又認爲鄧小平、彭眞後來因同在「一線」工作，逐漸形成一個與毛澤東相對立的政治聯盟關係（MacFarquhar 1974, 143, 145-146; MacFarquhar 1997, 443; Huang 2000, 198-200, 225）。相關敘述和說法與歷史實際情況有嚴重的出入，根本未察兩人皆是毛澤東的政治親信，以及彼此之間雖以合作爲主，卻也隱然夾雜競爭的特殊氣氛。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彭眞和鄧小平之間從首次認識到「文革」發生前後各階段的政治往來和工作配合爲何？其間兩者各自與毛澤東關係的親疏遠近相對有何變動？連帶政治效應又如何影響到兩人關係？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彭眞、鄧小平先後受到毛澤東拔擢進入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圈，後起之秀鄧小平在 1950 年代中期更超前彭眞，被選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新設的中央書記處也形成「鄧主彭副」的權力格局。鄧小平領導書記處在「一線」推行中央大政方針和維持黨國日常運作的過程中，甚爲信賴彭眞；彭眞稱職地協助鄧小平「負總責」，也因集聚權力在身而儼然成爲一實權人物。「大躍進」後的經濟調整時期，彭眞在政策觀點上比鄧小平還貼近毛澤東；「文革」前夜毛對彭眞的重視與熱絡，一度似有超過鄧小平。因爲彭眞位處政壇中心、經常出面管事，鄧小平得以藉之暫避事態鋒頭。未幾彭眞即身陷各種政治矛盾和衝突而失毛寵信，反而在鄧小平之前遭到政治整肅。總體而言，在「文革」前，鄧小平與彭眞之間沒有太大的政治嫌隙和對立，雙方關係大致維持平靜的表面下，也依稀存在一種同輩攀比和競爭；鄧小平同時對彭眞的政治能力和爲人，及其良窳特質，有近距離的觀察和體會。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彭眞與鄧小平之間早期的政治關係演變和工作互動情形，希冀透過比較的視野，增進對這兩位政治人物歷史的了解，並對認識中共高層菁英關係、政治運作和政策問題，以至「改革開放」前的政治史有所裨益。本文使用的

資料主要包括：年譜傳記、回憶資料、檔案文獻、「文革」批判資料、訪談資料，①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本文的章節安排，在前言之後，依序介紹彭眞和鄧小平在 1949 年以前的初步互動、1950 年代中期兩人相對權力地位的改變、他們在中央書記處內的共事情況、1960 年代初期就經濟調整問題的不同看法、「文革」前夜兩人相對政治地位的波動起伏，以及彭眞倒台時和「文革」期間的情況。

貳、兩人早年的政治互動（1938~1949）

彭眞、鄧小平兩人早年各自的政治發展途徑大有不同。彭眞在敵人統治下的所謂「白區」中工作，工作內容以工人運動和秘密工作爲主，地點集中在山西、河北、北平、天津。此外，彭眞還曾身陷牢獄六年，留下一段不短的政治空白。他出獄之後，適逢劉少奇前來重整華北的「白區」工作，並作爲劉的重要助手。1937 年底，彭眞和鄧小平第一次見面時，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

鄧小平的早期革命經歷，相較於彭眞豐富得多。鄧小平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後赴蘇聯學習一年，返國後曾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到廣西領導軍隊起事活動，之後轉赴江西「蘇維埃」地區，還因爲被當作「毛派分子」而遭受批鬥。鄧小平之後參與中共「長征」，重新回到軍旅工作。他與彭眞相遇時，正將前赴上任中共一二九師政治委員。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共如何應對戰爭和進行經略的問題，黨內高層存在不同的看法。毛澤東、劉少奇認爲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中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並尋機發展；王明、周恩來更側重加強國共合作以一致抗日。後者意見佔上風，並一度作爲中央的政策。1937 年底，王明主導的相關政策傳達至山西前線，彭眞和鄧小平同在聆聽。彭眞聞後頗不以爲然，認爲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慘痛教訓，就是不注重領導權的問題。1938 年初，彭眞、鄧小平短暫同行前往晉西南。兩人在路上交換意見後，咸認爲到地方傳達中央政策精神時，仍須強調獨立自主和爭取領導權。彭眞、鄧小平採取的變通方式是，首先傳達中央的政策精神後，再召集較小範圍的領導幹部加以提醒。彭眞所擬講稿事先給鄧小平看閱，在講完後即予燒毀（《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1, 98-99）。細究彭眞、鄧小平所爲，乃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此不宜留有字據。

事後來看，彭眞、鄧小平的暗中抗命有助於中共地方勢力的保存和發展。從政治的正確性來看，由於王明等的主張後來遭到放棄、批判，彭眞和鄧小平算是抗拒有理；這也可以看作尙屬中階幹部的兩人爲時甚短、但頗有收效的第一次政治合作。

彭眞和鄧小平在 1938 年初短暫相聚後，各奔一方。彭眞在聶榮臻開創的晉察冀根

註① 本文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爲重要的補充。爲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乃以甲、乙、丙…等代號名之，另外加上訪談的地點和時間。

據地負責黨政工作，短時之內即做得有聲有色。鄧小平則在逐步形成的晉冀魯豫根據地擔負軍政工作。在中日戰爭期間，彭眞和鄧小平並未在一處共事，僅在延安偶有零星的直接接觸。

1938 年 9 月底至 11 月初舉行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確認毛澤東的黨內領導地位和政治路線正確性，彭眞和鄧小平皆與會。會議期間，彭眞報告介紹晉察冀的工作，10 月 5 日，受到會議主席團的高度稱讚和評價 (《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1, 140-141) 。次日，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到統一戰線問題時表示：「形式是山西的，但主要內容是晉察冀的，必須注意山西形式」 (楊勝群主編 2014, 上卷, 339)。亦即他對彭眞參與形成、爲中央表揚的晉察冀統戰經驗，有所重視和師法，同時也注意結合其所在地方的實際情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中共中央重組北方局，由楊尙昆擔任書記，並有包括鄧小平、彭眞在內的委員 9 人；鄧小平在其中排序第 6，彭眞緊接在後。

中共中央在 1941 年初電召彭眞回延安，準備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簡稱「七大」)。彭眞到延安以後，他對中央政治局作了 7 次關於晉察冀工作的報告。毛澤東大加讚賞，彭眞在黨內的名氣更是直升。彭眞的官方傳記表示：鄧小平也曾參加聽取彭眞的報告 (《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1, 242-243)。但是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傳記和其他相關資料，卻無顯示鄧小平在此之時曾返回、停留延安。即便如此，由於毛澤東對彭眞相關報告的高度重視、鼓勵整理和廣爲轉發，鄧小平想必也有所知曉。

1942 年起，毛澤東在延安大張旗鼓地陸續推行整風、審幹和反奸運動，彭眞作爲其重要助手之一；後來毛進而推薦彭眞出掌中央組織部。鄧小平在 1943 年秋獲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其領導下的北方局組織部部長劉錫五宣稱：「中央現在的領導實際是由毛 (澤東)、劉 (少奇)、康 (生)、彭 (眞) 負責」(李新 2008, 191)。鄧小平對於彭眞在中央急速竄升的地位，應也會有所注意。

1945 年中共舉行「七大」，彭眞作爲此會的一名重要組織者。彭眞和鄧小平皆在「七大」首次當選中央委員。在依選舉得票多寡排序的 44 名中央委員中，彭眞位居第 18 位，留在前線並未與會的鄧小平，則處於第 28 位。彭眞在七屆一中全會還進而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取得政治局委員的身分，則要在十年之後 1955 年的七屆五中全會。

「七大」結束後，毛澤東親召鄧小平返回延安參加七屆一中全會。8 月 23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因爲毛自身和周恩來行將赴重慶談判，毛提議陳雲、彭眞爲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以保持書記處的持續運作，並爲會議所通過。鄧小平列席與會，親見彭眞進入中共中央最高的「領導集體」行列。兩天以後 (25 日)，鄧小平搭機返抵晉冀魯豫，與劉伯承隨即投入國共內戰。彭眞在 9 月中旬獲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並遠赴關外。

彭眞督率的東北局工作並不順遂，遭到陳雲、高崗、林彪等黨內同僚的告狀和抵制，其東北局書記職位約九個月的時間即遭中共中央撤換、降職 (鍾延麟 2016a, 102-

113）。彭眞後來在 1947 年中被中央調至劉少奇爲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工作；不久彭眞被指派前去「指導」其過去曾經管過的晉察冀，政治聲勢不若先前。相較之下，國共兵戎相見以後，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兵一方、逐鹿中原，肩挑艱苦作戰任務並立有戰功。

值得一書的是，隨著戰事的進展，1948 年 4 月、5 月之交，中共中央在擬議成立中原局的過程中，鄧小平偕同劉伯承在 5 月 5 日向中央提出：「中原局面太大，情況複雜，現在中央局的能力實難勝任；建議派彭眞來中原，改組領導班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中冊, 735）。鄧小平將中原局的領導職位虛位以待並向上舉薦彭眞，這具體反映他在政治上對彭眞的尊重和好感，其可能的原因有：

一、鄧小平對毛澤東個人及其思想、領導甚爲敬崇。他在 1947 年 6 月 21 日曾高倡：「凡是自己思想與黨中央、毛主席相抵觸的時候，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二十多年的歷史證明了毛主席是絕對正確的」（何方 2005, 537）。鄧小平過去雖未與彭眞共事，但是在擁護、確立毛澤東獨尊的領導地位上，他與彭眞有高度共識。後者在這方面大有貢獻、在黨內有目共睹，也爲毛澤東所喜而器重。有論者表示：在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上，「彭眞所起的作用大大超過鄧小平」（何方 2005, 538）。鄧小平由此而肯定彭眞，既有可能、也不令人意外。

二、彭眞在中日戰爭期間治理晉察冀有成，又能將相關經驗歸納整理、系統總結，既贏獲毛澤東的讚揚，也爲中共各領地之表率。鄧小平欲迎彭眞共管中原，既可人盡其才，同時或也可爲在東北失意的後者提供一個得以施展政治身手的機會。

鄧小平提議彭眞出掌中原局的建議，最終未被中共中央採納。從毛澤東爲首的中央爾後的人事布局來看—任命彭眞爲劉少奇爲首的華北局常委和中央組織部部長，可見其斯時首在考慮借重彭眞之力，以進一步地底定華北和主管中央組織與人事工作。彭眞如果知曉鄧小平曾推薦他任職中原局一事，應會對後者抱以感激之情。

1948 年 9 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彭眞和鄧小平皆到會參加。這可能是 1945 年 8 月 23 日延安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兩人相隔三年的首次共聚一堂。會後，鄧小平南下繼續投入戰事，先是參加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繼而領軍過江，直取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和經濟重鎮上海；之後又西進轉戰，最終坐鎮西南。彭眞在中共建政前後將主要精力放在接管北平，爲中共順利立都該地立下汗馬功勞。但相較於戰功彪炳、威名顯赫的鄧小平，彭眞就顯得相形見絀了。

參、鄧小平在政治上的後來居上（1952~1956）

一、「高饒事件」的影響

爲加強中央領導的力量，1952 年起，中共中央開始將各大區的方面大員逐步上調北京。最引人注目的是，東北局的高崗出任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鄧

小平雖不像高崗如此突出，也獲任政務院副總理，在政府系統中地位僅次於總理周恩來和主管經濟的副總理陳雲。由於彭眞和高崗在東北結怨，高崗升任中央要職，對之無異是黑雲壓頂；彭眞也交出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由華東局的饒漱石接任。

高崗在 1953 年不但是上串下連，更自認是爲毛澤東效命而出頭反對黨的第二號領導人劉少奇。高崗失之謹愼和策略，既造成政局不穩，也引發高層不安。是年底，鄧小平綜合各方面的考量（可能包括：鄧認爲高崗急欲對劉少奇去之而後快，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鄧研判高崗恐已與其他要人會商和串連，再不制止就有權力失衡、讓之得手的危險；鄧判讀毛澤東不欲見高層分裂擴大而較傾向穩定團結的心意；鄧也自認掌握高崗足夠的政治把柄，可以師出有名），見機向毛澤東報告高崗有違黨紀的言行，再加上陳雲對高崗的反戈一擊，促使毛澤東必須對高崗加以嚴肅處理（鍾延麟 2010, 541-545）。高崗因此頓然失寵、失勢，饒漱石也成爲此場政治鬥爭的陪葬品。

鄧小平告發高崗的複雜政治謀略和權力計算，巧妙地利用嚴守黨紀和鞏固團結的名義包裝，獲得毛澤東的肯定，劉少奇也因此化險爲夷、安度考驗；黨內的其他高幹如陶鑄對鄧小平亦心生佩服。對於彭眞而言，目前雖未見彭眞評論鄧小平在高崗問題的作爲的資料，但鄧小平相關舉動直接促成高崗的政治倒台，實同爲之解除心腹大患。鄧小平經此一役在中共政治中更上層樓，甚至是超過自身，彭眞也應較無惡感，以至是樂觀其成（鍾延麟 2010, 551-554）。

「高饒事件」以後，鄧小平的仕途確如平步青雲：先已是取代薄一波主管財政部，隨即接掌本來是彭眞、後來由饒漱石短暫主管的中組部，同時出任中央秘書長，繼而在 1955 年 4 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與林彪同時被補選爲政治局委員。自此以後到 1956 年 9 月中共舉行「八大」約一年多的時間，有一稍顯尷尬的情況：中共最高決策機關中央書記處開會時，彭眞因是候補書記，所以其是「參加」會議；鄧小平雖在會上同樣得以發表意見，但名義上屬於「列席」。另外，在黨的內部文件上，依照政治局委員的排序，彭眞排在第 7 位，鄧小平則敬陪末座第 13 位（中共北京市委 1955, 17-18）。然而，從 1956 年中共「八大」的準備工作，可以清楚看到鄧小平在黨內的實質權位已在彭眞之前。

二、兩人的「八大」職務安排和彼此地位的相對消長

1956 年 7 月 30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 20 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負責討論中共領導機構的設置方案和研究中共八大的選舉問題」。陳雲和鄧小平分別擔任第一召集人和第二召集人，彭眞排在陳雲、鄧小平之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中冊, 1300）。另外，鄧小平對中共「八大」準備事宜享有一定的裁量決定權，一個具體的例子是鄧小平負責安排和審閱「八大」與會代表的會議發言，彭眞預定的「八大」發言稿就是提交鄧小平審閱。鄧小平對彭眞精心準備的講稿，有所保留並主張修改；彭眞見到自己有興趣的部分悉數刪去，甚爲失望，最後就沒有在中共「八大」會上講話（《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3, 150-152, 155）。

政治上明白確認鄧小平的黨內權位超越彭眞，就是兩人在中共「八大」新人事安排中的相對位置。毛澤東主張原有職司最高決策的中央書記處改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同時另設一個新的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關於「八大」中央常委會的組成人員問題，根據訪談所得，最初構想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眞。易言之，彭眞是原擬的常委人選之一，其位在鄧小平之後。但是可能因爲與彭眞在東北有嚴重嫌隙的陳雲、林彪極力反對，導致彭眞「名落」鄧小平而「榜上無名」(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5 年 8 月)。

根據目前可得的書面文獻，中共「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表示：自己擔任主席，其以外過去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替補 1950 年病故的任弼時）「都當副主席」；另外，「推舉鄧小平爲總書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13, 卷 2, 606）。「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毛澤東 1999, 112)。簡言之，毛澤東就是將「七大」的中央書記處轉爲「八大」的常委會。「七大」中央書記處餘下的一名候補書記彭眞，猶如遺珠般地沒有在毛澤東的此一安排之內。反倒是原本與「七大」中央書記處根本沾不上邊的鄧小平，榮獲毛澤東保薦爲「八大」新設的總書記，並成爲新設常委會的一員。

中共「八大」正式召開的前兩天，1956 年 9 月 13 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又再次向與會人員鄭重推薦其屬意的中央主要領導人選，毛特別長篇大論地爲鄧小平宣傳。獲得毛推薦選任副主席的周恩來、陳雲和總書記鄧小平，皆有所推辭。鄧小平說自己擔任總書記「一不行，二不順」(楊勝群主編 2014, 下卷, 994)。根據訪談所得，針對鄧小平自稱的「一不行，二不順」，彭眞發言表示：「你一行二順」(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北京，2015 年 8 月)。亦即他要鄧小平安心就任。對於鄧小平自言出任總書記「不順」，有一種解讀是因爲鄧小平自覺其黨內地位，會因此超越比自己還資深的彭眞（包括政治局資歷和「七大」書記處候補書記身分)，所以感到有些彆扭。彭眞所作的「你一行二順」的表態，正可以化解其中的尷尬。

另外可能的解釋尚有：關於鄧小平的人事任命，毛澤東心意已決並公諸上層，彭眞縱有保留或意見，多說無益也不智，甚至可能討嫌。事實上，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特殊的歷史關係，尤其是鄧曾因毛而遭到連坐處分的經歷，以及毛對鄧長久以來的欣賞、愛護和拉拔，彭眞都甚爲明瞭清楚而不感突然。劉少奇也勉勵、勸進鄧小平接受中央總書記的職務，顯示有關人事任命乃是中央層峰的共識，彭眞根本無力扭轉。此外，彭眞欣然表達支持鄧小平出任中央總書記和進入常委會，同時是對鄧小平的一種示好，有助未來彼此間的共事和合作；他也可以藉此公開表示其自身能上能下、不忮不求。彭眞此番意在維繫團結的友善表態，可能也有助於他獲任黨內的新職。

彭眞在中共「八大」的權力重組中，與中共權力金字塔頂端政治局常委會擦身而過；但是他獲得的重要職務是：新建的中央書記處內排名第二位的書記，僅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之後。

毛澤東相當重視新的中央書記處，親自決定其職權是「管日常工作」、「很多事情要在那裡處理，在那裡提出議案」，也對其人數多寡予以指導。對於書記處成員名單，毛澤東也緊盯、掌握。他要求「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毛澤東 1999, 112)。9 月 15 日，中共「八大」開幕；會議主席團選出毛澤東爲首的現任 13 名政治局委員，由之組成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13, 卷 2, 627)。毛澤東領導的大會主席團常委會討論並提名「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成員人選以後，先提交大會主席團會議通過，之後再提交新選出的「八大」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中冊, 1317)。縱觀彭眞成爲「八大」中央書記處第二號書記的過程，無庸置疑地，毛澤東知悉、參與，也予以同意。

誰首先倡議由彭眞出任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書記？目前沒有資料能說明。彭眞對毛澤東如此忠貞和篤信，在延安整風、審幹過激和東北局爭論問題中也多少代之受過、承擔責任，甚至可能因此在「八大」入常委會問題上遭人杯葛；但彭眞卻仍可隱忍顧全大局、配合其新的人事布局(特別是關於鄧小平)。因此，有無可能是毛澤東提名彭眞以作爲政治犒賞和補償？或者有無可能是與彭眞多有共事經歷的劉少奇推薦？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知道彭眞熟悉中央政策、決策和運作，也長於黨務、組織和人事，確實是適任新的中央書記處的不二人選。

甚或者是，因爲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出任中央總書記，乃先於中央書記處成員名單的確認(毛澤東 1999, 110)。毛澤東是否有可能徵詢鄧小平的意見，問之欲讓誰作爲其書記處副手？彭眞對鄧小平出任中央常委和中央總書記的「成人之美」，鄧小平自是看在眼裡；因而是否有可能正由鄧小平舉薦彭眞，就像是 1948 年的中原局領導人事問題？從中央書記處正式成立以後的運作來看，鄧小平甚爲歡迎彭眞的加入並重視其角色作用。

最後，也可觀察一下中共「八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結果和排序情形。「八大」中央委員的排序乃基於當事人的得票數。鄧小平在全部 97 名中央委員中高居第 4 位，僅在毛澤東、劉少奇和林伯渠之後，還在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陳雲、林彪之前。這既反映毛澤東在選前爲之強力推薦的催票效果，也顯示其在中共黨內享有的高知名度和普遍好感。相對地，彭眞在全體中央委員中排在第 29 名，反映了黨內對於他在延安整風、審幹和東北局領導爭論，存有不小的不滿聲浪。兩者比較下來，鄧小平在黨內較孚人望。

肆、兩人在中央書記處內的工作互動

鄧小平和彭眞在中央書記處內的職務關係和分工爲何？1956 年 10 月 5 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書記處的工作範圍和人員分工。其中確定：「鄧小平負總責，並負責聯繫中宣部和中央農村工作部；彭眞協助鄧小平負總責，

並負責統戰、政法和港澳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中冊, 1318)。鄧小平主持決定的中央書記處成員分工，經過 10 月 8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一次擴大會議討論，最後在 10 月 15 日爲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通過。

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將鄧小平與彭眞的工作關係界定爲：「彭眞協助鄧小平負總責」。此議爲毛澤東領導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採納。如此將彭眞在中央書記處內的政治地位和權責明確爲：在鄧小平一人之下、其他所有書記之上；並責定其輔佐鄧小平承負領導書記處工作成敗的政治責任。鄧小平對彭眞如此重視和寄望，除了不無可能是基於中央層峰（毛澤東、劉少奇）的事前示意，也可能肇因於他對後者資歷、資格的敬重，或還有對後者坦然接受他後來居上的投桃報李。此外，亦存有一種工作互補的現實需要。

鄧小平工作和辦事的一個重要風格是果斷、俐落地緊抓大事和拍板決策，周恩來曾以「舉重若輕」概括；至於後續的具體落實和細節管理，鄧小平則較少過問或乾脆放手讓他人處理。針對「八大」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鄧小平也需要有一個書記處成員足堪扮演類似得力助手的角色，能有效率地張羅和處置政策執行的繁雜事項，爲之分擔責任和分攤工作。

彭眞獨當一面、統領全局的能力，較不突出（其領導東北局時或可以反映）；但他在微觀管理和參謀作業的能幹，在 1940 年代前半期協助毛澤東管理延安中央黨校的過程中多有展露。再加上，彭眞做事認眞、一抓到底、態度負責的特質，以及他先後出任「七大」、「八大」政治局委員的身分，亦爲其他書記處成員所不可企及，使之可以勝任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二當家」。

1958 年 2 月，爲準備發動「大躍進」，毛澤東指示「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自此從管理黨的日常事務進一步擴增至監管政府工作，以貫徹「黨的領導」和「以黨領政」。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內對彭眞的倚重，使後者的權力更是相對大增。鄧小平在書記處工作上讓彭眞挑大樑和挑重擔，可以從以下多方面看出：

一、鄧小平經常讓彭眞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和工作。鄧小平出國訪問、移地開會、地方視察或是生病休養時，多交由彭眞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根據彭眞官方年譜的資訊，從 1956 年秋中央書記處成立運作至 1966 年初，正式編號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超過 400 次，由彭眞主持的書記處會議近約 60 次（其中最密集的是 1959 年 6 月至 11 月鄧小平腿傷療養、由彭眞代理主持的期間）。若再加上其他未加以正式編號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以及以中央書記處名義召集的各種彙報、工作或電話會議，彭眞出面主持的會議次數就更多了。

中央書記處有正式編號的會議，其開會頻率和次數在 1963 年以後明顯地逐年減少。這直接反映鄧小平對領導中央書記處工作的積極性，相較之前大爲消退。鄧小平對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處理，更多地經由文件傳閱和審批，還有交託彭眞承辦與出面。周恩來在 1964 年也有「黨的事情只有彭眞在管」的觀察和評論（李志綏 1994, 422）。

二、中央書記處開會前的準備事務和會後的落實工作，鄧小平都交由彭眞處理。

相較於周恩來召開會議時間的冗長，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時間明顯較短。這除了因爲鄧小平不拖泥帶水的議事風格，彭眞在會前幕後的詳密準備，便利會議效率的提高，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彭眞對於會議議程事項的具體安排，討論議題的資料彙整和可能解決方案擬定，以至中央批示的預擬，都加以張羅，甚至在開會以前即與鄧小平通氣、商量（李海文、王燕玲編著 2002, 129）。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上做出決定以後，彭眞也負責具體安排後段的執行工作。

三、中央書記處在夜間時段的工作，鄧小平交付彭眞處理，以致後者有「夜間總書記」之稱。「文革」以前中共中央有一個早晚值班的分工：白天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晚上是周恩來和彭眞。毛澤東主要在夜間活動，當他有事時即召喚周恩來或彭眞。因此，彭眞在下班休息以前，通常會請秘書打探毛澤東、周恩來是否已經休息；即便彭眞已服安眠藥睡下，一旦聞知毛澤東傳喚即起床整裝前往，讓妻子張潔清不免擔心彭眞在與毛談話時是否能維持神志清醒（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北京，2015 年 8 月）。另外，彭眞在中央值夜班，也可以處理下級臨時提交中央裁示的緊急事宜。例如：關於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內容安排問題，其常務副總編輯胡績偉夜裡常找周恩來和彭眞尋求指示。

鄧小平主要在白天工作，到後來不全是早睡之故，而與其甚爲重視休閒玩樂有關，1961 年以後他更逐漸形成固定時段打橋牌的習慣：週三晚上 7 點到週四凌晨 3 點、週六晚上 7 點到週日凌晨 3 點、週日下午 3 點到週一凌晨 3 點。相對地，彭眞通常白日已是工作滿檔，晚上又因在中央值班和待命，往往工作到凌晨 2、3 點，有時甚至通宵達旦。

四、中央書記處對中央黨政部門的指導工作，鄧小平信託彭眞參與處理和經管。在中央書記處會議的平台上，彭眞偕同鄧小平督導中央部會的工作，對之發號司令，特別是在政治運動過程中（如 1957 年「反右派」），常見鄧小平、彭眞一搭一唱地對中央各部督促和施壓（鍾延麟 2014b, 261-262）。1959 年秋冬中央黨政機關的「反右傾」運動，更是由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彭眞聽取中央黨政各單位彙報運動進度（鍾延麟 2014a, 107-111）。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或因知道彭眞在延安時期實際主持中央黨校和司掌中央組織部而熟悉幹部，中央組織工作也讓彭眞具體多管。鄧小平主持討論幹部問題時，彭眞通常在座參加；一些重要幹部的處置問題，如因批評「大躍進」而惹禍的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鄧小平交付彭眞研議處理（中央組織部《只爭朝夕》戰鬥隊 1967, 22）；許多涉及幹部處理和調動的問題，彭眞直接與中組部部長安子文討論決定，安子文經常打電話或前去彭眞家研究幹部問題（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 年 8 月）；安氏也曾表示彭眞與劉少奇、鄧小平同是可以代表中央的領導人（中央組織部《只爭朝夕》戰鬥隊 1967, 27）。中組部上呈中共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彭眞事先過目和審閱（《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434）；彭眞也經常對中組部發予指示，該部人員就回憶聽聞彭眞的工作指示多過於鄧小平（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戊君，北京，2015 年 3 月）。

五、在對地方黨委工作的領導上，鄧小平也很重用彭眞。中央書記處透過召開電話會議，代表中央對地方黨委領導人進行遠端指揮時，因爲通常在夜間舉行，而且電話通信品質不佳（鄧小平聽力差而通話不便），所以多由彭眞代表出面；中共中央欲向地方布置工作，彭眞銜命奔走各省。1957 年整風運動期間，彭眞前赴上海、天津、南京、武漢、鄭州推動「大鳴大放」。彭眞後來對此表示：「毛主席和書記處派我到這些地方去『點火』」（劉政、張春生 2013, 144）。

六、黨對外關係的經營和管理，是中央書記處工作重要的一環，鄧小平和彭眞之間在此方面亦有密切的合作。中共的外事工作和涉及政府外交的領導工作，鄧小平藉由批轉文件讓彭眞知曉和參與。鄧小平、彭眞經常一起會見外國黨的代表和人士；當來訪的是較爲次要的友黨外賓，或就由彭眞代爲接見。更重要的是，爲因應日漸惡化的中蘇兩黨關係和擴大的意識形態爭論，鄧小平和彭眞有時一人留守北京書記處負責後方指揮、連絡層峰，另一人承命出國、直接應戰，1960 年夏的布加勒斯特會議，即是鄧小平在國內坐鎮，彭眞出馬；彭眞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的表現，鄧小平就大加好評。鄧小平、彭眞在 1960 年（3 次）和 1963 年也一道前赴莫斯科迎戰蘇聯「修正主義者」（鍾延麟 2016b, 70-71, 74-77）。

七、彭眞在中央書記處內也經常承擔一些不失重要性的談話或「跑腿」任務。譬如中共中央決定了重要的人事任命後，彭眞經常代表中央書記處勸說當事人接受職務安排並傳達、布置中央最新的工作指示。1959 年廬山會議揪出所謂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羅瑞卿獲命接替黃克誠出任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長。「文革」的揭發資料指出，羅氏曾說：「彭眞勸我去，彭還說，你不去掌握軍權，誰去？任務雖重，但也有好處，可以多接近書記處，多接近鄧小平，多取得他們的指示。」（紅代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東方紅》編輯部 1967, 2）

鄧小平和彭眞之間在中央書記處的互動關係和模式，有訪談對象將之扼要概括爲：彭眞對鄧小平很尊重，鄧小平對彭眞很放手（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己君，北京，2011 年 7 月）。但更細膩的觀察可以發現：彭眞對鄧小平並非無原則的尊重，而鄧小平對彭眞也非無界限的放手。

從彭眞方面來看，彭眞在中央會議上與鄧小平討論工作時，並非唯唯諾諾，而比較像是同志式的交談，有時還會不假辭色地當面提出異議。例如：1962 年初旨在檢討「大躍進」問題的「七千人大會」期間，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報告初稿中著重批評「分散主義」，並舉北京市的加工生產爲例，彭眞並不贊同；鄧小平主張將「分散主義」與「資產階級思想」加以連結和批判，彭眞也表示無法說服於人（張素華 2006, 102-103）。

彭眞對於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表現，也曾直率提出批評性的意見。在前述同一會上，關於「大躍進」的責任歸屬問題，鄧小平和彭眞咸認爲他們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中央內應負主要責任，但彭眞進而直言：「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張素華 2006, 107）。另外，對於重大情勢判讀和重要議題看法，彭眞也會有自己的思考，不見得唯鄧小平是從。這最集中表現在 1962 年的經濟調整工作（將在下一節詳

述)。

從鄧小平方面觀之，鄧小平和彭眞一起對下級指導工作時，他若覺得後者的建議不妥，當場予以指正，1964 年他們視察內蒙古指導當地鋼鐵生產和水利建設規劃時就曾發生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黨史研究室 2004, 86-88)。彭眞對特定人事問題的處置，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不滿校黨委書記胡錫奎並堅決要求處理，彭眞敷衍而未加理睬。鄧小平出於推展工作的需要，逕行決定調動 (鍾延麟 2015, 142)。另外，更敏感的是，針對彭眞偶在檯面下進行政治操作的情況，鄧小平聞知以後也曾表露些許不悅。

在鄧小平的認可下，彭眞在中央書記處內握有重大的實質權力和施展空間，對權力流向甚爲敏感的其他中央高級幹部，進而將彭眞看作是一名說話有力、辦事得力、值得交往的中央領導人。例如：軍隊元帥賀龍在中央兼管體育工作，當相關業務需要交由中央審定時，他就認爲找彭眞可以高效率地解決問題。根據「文革」的揭發資料，賀龍曾言彭眞：「這個人很能幹，很聰明，雖是高小生，但能文能武」，「是常務書記，在書記中管事很多」，「是被培養的大接班人」；賀龍曾針對國家體委具體工作問題表示：「給彭眞寫個報告去！」「找大脖子 (彭眞脖子厚粗) 去！上吊要找粗樹幹嘛，細樹枝吊不死人的。」(李正中編 2015, 149;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宣傳組 1967, 10; 國家體委系統革命造反聯絡總部 1967, 4) 彭眞也可能因大權在手，利用職權之便和伴隨形成的政界人脈網絡，謀求推行自己所好的政策主張。

1960 年代中，中共中央提出備戰的要求，彭眞向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欲將河北軍事要地張家口劃入其下轄的北京市，彭眞表示已與其熟識的賀龍和楊成武商量，並獲得他們同意。李雪峰未予答應，表示應交付中央書記處決定。李雪峰告知鄧小平此事，鄧表示不知情，也對彭眞不同之商量和請示有批評之意。彭眞後來聞知李雪峰已向鄧小平報告，並知曉鄧的批評意見後，便悻悻然地放棄 (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庚君，北京，2011 年 7 月)。

鄧小平對於彭眞協助他在「文革」前十年處理繁重的中央書記處工作，總體上是感到滿意的。鄧小平自認主持中央書記處時期，是他生平最忙的階段。可以設想若無彭眞從旁襄助，鄧小平對書記處的領導工作必定更加忙碌和吃重，遑論還有閒餘時間讓之從事消遣娛樂。

鄧小平讓彭眞在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發揮餘地，也使之必須承載巨大的行政工作負荷。鑑於彭眞在中共「改革開放」時期對法制建設的貢獻，以及他在「文革」前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的辛勞，1988 年有些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和代表醞釀向中央提案表彰彭眞的功勳，但最後被彭眞勸退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 2002, 311, 318-319)。

伍、兩人在經濟調整時期的政策分歧

1956 年秋中共中央書記處成立之後，鄧小平、彭眞領導中央書記處先是在 1957

年積極貫徹毛澤東倡議的整風和「反右派」運動，繼而在 1958 年至 1960 年督促中共各級幹部堅決推行「大躍進」運動，戮力將毛澤東嚴重脫離實際的主張付諸實踐。在前述的政治過程中，鄧小平和彭眞之間在政策觀點上無所差別，都是毛澤東治國狂想的信從者和行動者，他們對於相關政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對其災難性的後果也皆難辭其咎（Chung 2013, 154-173; Chung 2015, 129-143）。如何應對「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局，鄧小平和彭眞在政策上未像先前的高度一致，而是有所差異。

一、對經濟情勢的不同估計

1962 年 2 月下旬起，劉少奇領導「一線」領導人積極著手經濟調整。陳雲的判斷和主張—經濟情勢仍屬嚴重困難，需要「傷筋動骨」大幅調整和需時四、五年恢復元氣，獲得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認同和支持。這一時期的經濟調整工作，也由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劉少奇，恢復設置的中央財經小組（其統管經濟工作，組長陳雲因病常請假）的實際主持者周恩來，以及主持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相互配合、具體領導（楊勝群主編 2014, 下卷, 1232）。彭眞傾向持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作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估計，並以資深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第二號書記的身分參與討論調整工作。

針對彭眞在「一線」討論過程中提出的若干異議，鄧小平往往「四兩撥千斤」，當場裁示解決。例如：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在國務院報告會上所作的經濟問題講話，彭眞認爲不應只向下傳達陳雲的講話。鄧小平聞後立即拍板：「這個事簡單，三個人的講話，一起都傳達。」另外，應該如何表述當前的經濟階段和任務，彭眞不贊成陳雲主張使用的「恢復時期」，而出現使用「恢復時期」或是「調整時期」的議論，鄧小平將兩者加以折衷：「對外講調整時期，對內講我們進入一個恢復時期。」（鄧力群 2012, 13）如此反映鄧小平明快的個性，以及其不欲爭論、首重解決問題的行事風格。

1962 年 4 月 17 日，經彭眞審閱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團結奮鬥爭取新勝利〉，其中對經濟情勢表示：「目前，雖然在我們面前還有一系列的艱巨的工作要做，但是，總的說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國民經濟情況已經開始好轉。」(人民日報 1962）相關文字或反映彭眞欲對外安定人心，但也顯示他對此一問題繼續堅持原有看法，並且不忌將之表諸黨報社論。

圍繞在經濟調整問題的爭論，也隨後出現在有各地中央局書記出席的 5 月中央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的此一會議的基調，乃依照陳雲的經濟調整思維；會上討論的主題，則是周恩來相應提出的具體政策方案。根據列席此會的鄧力群的回憶，會上僅有二人對周恩來的政策報告「有不同意見」：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和「北京的同志」。他倆「主要是對那個時候困難的估計有沒有那麼嚴重、城市的職工回鄉 1000 多萬人是不是需要那麼多，表示懷疑」。相對地，其他地方的中央局人士都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與安排，並指出上海、北京不覺問題嚴重、進而不認爲需要採取相關調整措施，

正因爲京、滬等大城市有其他地區支援、確保供應無虞，而倖免於斷炊之險。柯慶施和「北京的同志」聞後無話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 2002, 147; 鄧力群 2015, 380)。

鄧力群隱諱其名的這位「北京的同志」，從其較不認爲情勢嚴重困難的政策立場，基於北京市的大城市觀點和意識，膽大發言、力排衆議所反映出的位高權重，以及彭眞全程出席會議的情況 (《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194-195)，此人或有可能是彭眞意見的代言人，甚或就是彭眞本人。

劉少奇在 5 月中央工作會議最後表態支持周恩來、陳雲的調整構想和政策方案，鄧小平也表示「沒有不同的意見」，主張按之執行 (鄧小平 1994, 318)。

針對經濟情勢的估計問題，1962 年前半年彭眞和鄧小平之間看法存有差別，1962 年初夏進而出現彭眞當面向鄧小平陳述意見的情況。7 月 2 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當談及數位地方中央局領導人對此前一段時間總講錯誤和困難「有意見」，並提到根據柯慶施、陶鑄所言，毛澤東也有「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後要講克服困難」的言語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3, 下冊, 1230-1231)，彭眞對鄧小平表示「講困難缺點到此爲止，應轉爲積極方面」，並強調「這是相當重要的事」。鄧小平聞後回應：「我傾向這樣。」(《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204) 亦即鄧小平對經濟情勢原先較爲審愼、保守的立場，至此有所鬆動。

二、對包產到戶的迥異看法

1962 年經濟調整期間，除了對經濟情勢有不同評估，彭眞和鄧小平另一個明顯而重大的政策分歧，就是如何看待農村包產到戶等相關問題。

在人民公社制度問題上，從 1961 年春到 1962 年初夏，可以注意到彭眞和鄧小平之間從想法一致到有所區別、分隔的發展過程。針對人民公社內部的結構主體和核算單位問題，鄧小平、彭眞原本偏向於以生產大隊爲主，在 1961 年春遭到毛澤東批評，甚而被其要求下鄉實地調查。之後鄧小平、彭眞皆跟隨毛澤東的立場，支持將公社內的領導生產和經濟核算權力下放至生產隊。與此同時，針對若干地方出現脫離公社體制、主張試行包產到戶的現象，彭眞和鄧小平也緊跟毛澤東加以否定：彭眞嚴令北京市不仿照試驗，堅守公社體制；鄧小平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期間 (1 月 25 日)，亦針對公社問題表示「當然跟主席走」(張素華 2006, 111-112)。

2 月 7 日鄧小平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的文件時，認爲維持「以生產隊爲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以生產隊爲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之「根本制度」的時間，無需長達「四十年」，可縮短成「至少二十年內」；毛澤東閱後反而覺得「以改爲『至少三十年』爲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下冊, 1690-1691)。亦即鄧小平對相關公社「根本制度」表現得比毛澤東還有信心，認爲其在較短的時間內可帶領中國農業「過關」並朝向更高級的組織形式發展。但是在 3 月底以後，鄧小平的態度有所變化。

3 月 29 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討論河南、山東農業問題時表示：「原則是哪種辦法在哪些地方見效快，就用哪種辦法。不要拘泥於形式，不要擔心個人多了，集體少了」；「無非是單幹，單幹也只有百分之十幾。出點富裕農民也不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下冊, 1697-1698）。鄧小平的官方傳記對此指出：「實際上反映了他對調整農村政策的新的思想認識」（楊勝群主編 2014, 下卷, 1239）。彭眞也有出席此會，但他現有公布的發言內容，沒有涉及這方面的話題。鄧小平在 6 月可能受到鄧子恢、李富春、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等人的影響，愈加接受包產到戶的主張。陳雲更進一步地提出分田到戶，並在同月下旬與鄧小平交換意見。鄧小平表示：「分田到戶是一種方式，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下冊, 1712）

相較於鄧小平在短時內大幅度地立場擺動和轉變，彭眞倒是顯得「立場堅定」、「始終如一」。彭眞在 5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5 月 11 日），不無針對性地表示要「堅持按勞分配」以「鞏固集體經濟」，從而防阻「出現變相單幹，擴大私有部分」；他並強調「不抓好」「鞏固集體經濟」，「調整也不可能抓好」（《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194-195）。6 月 19 日，彭眞在更大範圍的北京市黨代表大會上表示：「有人想單幹，舊中國幾千年的單幹有什麼好處？想私商好，幾千年私商有什麼好？」（彭眞 1962, 16）

彭眞在 6 月 20 日因陪同外賓前去武漢，並在次日與毛澤東、柯慶施等會面。毛澤東、柯慶施在武漢曾專就農業問題進行交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13, 卷 5, 107-108）。反對包產到戶、「單幹」的彭眞，是否有利用這次在武漢的機會與毛、柯交換相關意見，甚或是交相強化彼此反對包產到戶的立場，不得而知、也無法貿然臆測。

在 7 月 2 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除了前面所提的彭眞在鄧小平面前直抒對經濟情勢的看法，從目前可得的鄧小平、彭眞各自的片段發言紀錄中，可以辨析出兩人在恢復農業生產問題上，也有隱然交鋒和殊異考量。鄧小平表示：「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眞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鄧小平 2014, 146）。

相對於鄧小平爲求恢復農業度過當前難關、生產組織形式可不拘一格的思考，彭眞思慮、關心的焦點是：如何在維持現有公社體制下調整政策，避免「集體經濟要垮」。他表示：「這幾年，包括毛主席的話，也不那麼靈了，因爲其中包括不正確的，許多問題是沒有經他反覆研究被迫決定的。我們書記處的同志，不要亂出點子。沒有調查研究出點子，這是很大的教訓。」（《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204）彭眞先前在「七千人大會」期間曾批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因此，他這時不無可能是向鄧小平和其他書記處同僚示意：「不要亂出點子」，而包產到戶和分田或就是其未明說的「餿主意」。

關於是否允許開放包產到戶等問題，鄧小平沒有採納彭眞主張的「鞏固集體經濟」、愼防「集體經濟要垮」意見，不但已開始思索、煩惱在現實中要如何重新分配土

地（鄧力群 2015, 437），更在 7 月 7 日對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志的講話中，就農村生產組織形式問題，公然再提「黃貓、黑貓」一說，主張靈活、多樣（薄一波 1997, 1119）。

三、毛表態批評後的兩人處境

毛澤東與柯慶施等在武漢談話以後，在周遊各地北返途中，又聽聞一些地方官員和駐地將領對生產情勢的樂觀言語，更加堅定反對包產到戶的決心。毛澤東在 7 月 6 日返京後即讓田家英、陳雲、劉少奇當面難堪；鄧小平聞知後也急忙改口，交待共青團收回他的「貓論」。毛澤東火氣未消，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情勢估判悲觀的「黑暗風」、倡議包產到戶和分田的「單幹風」和對先前政治批鬥不服（尤指彭德懷）的「翻案風」。

相對於鄧小平被動地立場轉彎、表態跟上，彭眞在北戴河則是身處順境。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將「黑暗風」和「單幹風」結合在一起批判時，彭眞提供的北京市郊農業行將恢復的資訊，即被毛澤東引爲一具體正面實例，佐證其經濟好轉、根本無須包產到戶的看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3, 下冊, 1246）。在之後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上，自田家英看來，彭眞、柯慶施、羅瑞卿對「單幹風」的批評，比毛澤東還嚴厲（董邊、鐔德山、曾自編 1990, 71-72）。針對「黑暗風」，據比較和分析，也很可能是彭眞所作的嚴厲批評：「現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躍進說得越不像話越好，越鬆勁、越單幹越好。今後五年，不能光講是恢復。」相關講話還當場引起毛澤東的同感。②

在經濟調整期間，彭眞自視正確，在中央會議上「頂」過周恩來（李正中編 2015, 330）；彭眞在「文革」中也被揭發此時曾試圖暗中遊說策反，劍指陳雲（鍾延麟 2016a, 123）。目前沒有資料顯示彭眞曾就相關問題批評或是爲難鄧小平。

陸、「文革」前夕兩人的政治消長和互動

從 1964 年底至 1966 年初這段時間，鄧小平和彭眞受到毛澤東重視的程度，以及各自與毛之間的關係和距離，出現了微妙的消長變化。

毛澤東對於鄧小平在 1962 年包產到戶等問題上立場「右傾」有所不快；毛澤東在 1964 年又覺得鄧小平和受其領導的國家計委（李富春司掌）對他的「三線」建設倡議不積極跟上。同年底，毛澤東批評鄧小平「搞獨立王國」，更欲在組織上進行調整。毛澤東首先提出成立「小計委」，由開發大慶油田立功的余秋里負責，實際架空李富春、

註②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雖只以「有的同志」稱之，而無明說其姓名。但是比較《毛澤東年譜》所透露的資訊，包括：發言日期、場合和毛澤東插話的時機和內容。此人很可能就是彭眞（薄一波 1997, 11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13, 卷 5, 159）。

以至鄧小平制定重大經濟規劃的權力。毛澤東的怒火還繼續往上延燒，進而提出：在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之外，「另外搞個書記處」。鄧小平知道毛此舉顯然是衝之而來，自然「不好講話」，不便發表意見（張培森整理 2009, 36）。

毛澤東對「小書記處」的具體構想爲何？根據訪談所得的資訊：毛澤東乃想從既有的中央書記處內抽調兩、三人出來組建「小書記處」，直接歸其所管，而且就此徵詢彭眞的意見。如此直截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不復信任的同時，仍然對彭眞看重有加。彭眞如何回應毛澤東的「小書記處」倡議呢？根據訪談所得，彭眞表示：計委是工作部門，對於另外成立「小計委」沒有意見；然而，中央書記處乃按黨章規定成立，另外成立「小書記處」，則不符合相關規定（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辛君，北京，2014 年 11 月）。

如果以上資訊確實無誤，除了可以給予彭眞剛直、守法的表面性解讀外，是否也有其他可能的政治解釋？例如：彭眞不欲讓其書記處上級鄧小平過分難堪；抑或是彭眞在書記處現有的權力結構中已是充分獲得授權並行使重權的「二當家」，在總書記少問事、不太管事的情況下，又經常可以代行其事。另行成立「小書記處」，疊床架屋，既有違體制、又顯多餘；在其中任事，或還可能限縮其身手。

毛澤東倡建「小書記處」一事，可能因爲見到周恩來的有所異議（其表示「這個恐怕不好吧」）和彭眞的未予積極響應，最後只好打消此意。但是自此到彭眞倒台、「文革」爆發之前約有超過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召集彭眞、與之見面的次數，遠超過了鄧小平。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1965 年鄧小平與毛澤東一起開會，以及共同參加對外接見和公開儀式活動的次數，總計還未及 20 次；但在同一年之內，毛澤東單獨找彭眞就達 58 次（劉政、張春生 2013, 156）。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後，有時也會單獨留下彭眞繼續談話（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 年 8 月）。如此反映了毛澤東在這段時間中對彭眞熱絡和信任的程度，恐都在對鄧小平之上。究其原因，可能不僅在於鄧小平單方面有意對毛澤東進行政治閃躲，而是同時含有毛澤東主動選擇拉近彭眞、推遠鄧小平的因素。

另一個顯示彭眞地位上揚的重要政治動向是，毛澤東讓彭眞聞問軍隊事務。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時，因兼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常委（毛澤東和鄧小平是軍委會內唯一兩位文職成員），可以直接過問、管理軍隊事務，這是欠缺軍事資歷和職位的彭眞所不能企及的。彭眞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位置上略爲接觸軍隊事務，主要經由其與賀龍、羅瑞卿之間密切的公事互動和多年形成的熟稔信任，以及部分軍隊將領對之的主動靠攏、攀附。但是約莫在 1965 年末或 1966 年初，彭眞的住所裝設軍隊專用電話，亦即其開始直接與聞軍隊問題，而這勢必出自毛澤東的旨意（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 年 8 月）。

「文革」爆發前約一年半載的時間，彭眞受到毛澤東政治關愛，雖似超過鄧小平，但兩人之間在政治上的合作還是大於競爭。事實上，在「文革」前夕複雜詭譎的政治情勢和變化無常的政治發展中，彭眞經常衝在前頭、不吝表態和據理力爭，反倒成爲鄧小平在政治上得以降低衝撞力道的一道安全閥，使之不必直接捲入愈加急轉的

政治漩渦和愈漸分明的政見分歧。

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改稱「四清」），在 1963 年運動開展階段，鄧小平和彭眞皆留心避免過大的運動打擊面以及其對生產的可能影響。劉少奇在 1964 年中主導社教後，運動大爲激化，直到同年底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1965 年初社教方向才較爲緩和，並具體表現在所謂的「二十三條」。中央書記處內由彭眞出面負責主持社教的政策調整。

彭眞在北京郊區通縣的運動作法—重審並「解放」先前被批鬥、羈押的基層幹部，以及強調生產的重要性，獲得鄧小平的肯定並推薦（《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3, 1126-1127）。另外，作爲高等教育學校社教試點的北京大學的運動發展，1964 年下半年也因受劉少奇運動主張的影響，出現中央宣傳部爲主的工作組猛批現任校領導的激進局面；由於北大黨委在政治上向來歸彭眞爲首的北京市委領導，所以彭眞一時尷尬也不好表態。1965 年初運動轉向後，彭眞要先前否定北大校領導的工作組轉變立場，鄧小平也予以同意和支持（《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3, 1141）。彭眞進而向前一階段校內的運動「積極分子」施壓，要之檢討。

這種鄧小平、彭眞兩人觀點主張相近、但由彭眞出面處理而容易得罪人的情況，也可見於整肅羅瑞卿事件和因吳晗劇作引發的文藝批判爭論。1965 年底羅瑞卿遭到中共中央批鬥，與羅氏工作關係密切的鄧小平和彭眞，都感到突然和錯愕，並且在比較被動的情況下接受羅氏政治倒台的事實。事發後，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眞和葉劍英進一步地調查羅氏的「錯誤」。鄧小平赴「三線」調查閃避此事，交由彭眞具體負責。彭眞在後續調查過程中主張對羅瑞卿問題的揭發要符合實際，也不要強迫羅氏認罪，如此讓軍中積極倒羅的將帥和先鋒感到惱火並伺機告狀。

另外，1965 年春，鄧小平、彭眞對於學術、文藝批判的日趨政治化和尖銳化，皆有反感；對於同年 11 月突然冒出批判吳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們都不明就裡，初始也不太買帳，鄧小平照樣找吳晗打牌，彭眞之後雖然對吳晗開始批評，但也爲之澄清。彭眞身爲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1964 年 7 月由毛澤東提議成立和任命），之後負責起草中央對有關問題的指導文件—《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在此一政策文件形成的過程中，彭眞代表中央書記處、中央「一線」，直接向毛澤東商議和請示；鄧小平連同劉少奇、周恩來對於彭眞居間聯繫、試圖導正文藝批判方向的文件內容，皆予同意，鄧小平也在 1966 年 2 月 12 日以中央名義簽批轉發（楊勝群主編 2014, 下卷, 1325-1326）。次月底，毛澤東因爲康生告狀彭眞欲追究查處所謂「左派」文人而勃然震怒，致使局勢丕變、逆轉。

從處理吳晗問題到制定「二月提綱」，鄧小平和彭眞的立場並無二致，也不吝表達支持，但是站在前線處理的彭眞，在此期間和其後是否因自感聖眷垂顧，在毛澤東面前較不忌表達己意，甚至意圖從中對之引導和影響，不料反而令毛狐疑和生厭？彭眞是否過於自認大權和眞理在握而矯枉過正、行事過急，但卻落人話柄，甚至讓有心人得以藉機向毛進讒？事實上，類似傾向在彭眞 1965 年接手主持「四清」後和 1966 年初調查羅瑞卿問題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柒、鄧小平對彭真倒台的態度和「文革」中的情況

1965 年至 1966 年初，彭眞在中共政壇炙手可熱、極其活躍；但如前所述，未幾他因社教運動、羅瑞卿調查問題、文藝批判爭論等交相纏身，不但短時內多方樹敵，在諸事合力下更直接惡化了毛澤東對之的觀感和認知，終而在 1966 年春暴落。針對彭眞的政治倒台問題，根據鄧榕的說法，鄧小平後來表示：「彭眞的問題本來不大。我沒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給彭眞，表明態度。」鄧榕對此解釋：「不附和，送橘子，以當時的形勢，父親只能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態度。」(毛毛 2000, 12) 鄧小平何時送半筐橘子給彭眞，以示致意和送暖，目前無可考。另外，在批判、處理彭眞的問題上，鄧小平的相關言行恐怕也非「不附和」一詞可以概括。

1966 年 3 月底，毛澤東因爲「二月提綱」相關問題決定批判彭眞後，派遣康生、陳伯達回北京傳達其意見。本來在外地的鄧小平，在電話中聽到康生的介紹後，覺得茲事體大，即在 4 月 4 日下午，搭乘專機從延安返抵北京。當天晚上，彭眞到鄧小平處談話。6 日下午，鄧小平和彭眞在周恩來處談話 (《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479-480)。這兩次談話的具體內容和情況皆不詳，但之後就開始啓動批判彭眞的進程。鄧小平在 4 月 9 日、11 日、12 日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如何落實毛澤東的政治決定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下冊, 1907-1908)。鄧小平在會上「表態擁護毛批彭的指示」，並且與周恩來一道批評彭眞執行的「錯誤路線」，乃是「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鄧小平和周恩來也作自我批評，檢討他們身爲中央常委有所「失職」的問題 (高文謙 2003, 108)。彭眞也檢討自己的錯誤。

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撤銷彭眞主持的「二月提綱」；成立陳伯達爲首的起草小組，爲中央起草文化革命的文件。亦即拔除了彭眞在中央負責領導文化革命的職務。最後，鄧小平執筆撰寫周恩來、鄧小平、彭眞三人聯名給毛澤東的信。其中表示：彭眞和到會的中央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1998, 下冊, 1839)。有論者指出：「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附和屈從」，令毛澤東可以無所顧忌、繼續恣意妄爲 (高文謙 2003, 109)。

針對彭眞的政治批判，接續移師到 4 月 16 日至 24 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中曾就滬劇《蘆蕩火種》在北京演出天數的問題，批評彭眞治下的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毛澤東當場詢問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意見。鄧小平表示：「我和彭眞同志的工作關係是正常的。」相對於鄧小平意在劃界自清的回覆，周恩來倒是稍爲彭眞緩頰，表示：「我找北京市的人，要找什麼人就找什麼人。」(《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b, 卷 4, 482) 彭眞在會議期間自我檢討提到「二月提綱」問題時，劉少奇、周恩來插話表示他們也有責任，彭眞表示：「這個提綱錯了，應由我

個人承擔責任，與少奇同志、總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無關。他們沒有也不應承擔責任。」(《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3, 1224) 亦即其一肩扛下「一線」領導人 (包括鄧小平在內) 先前咸主張限縮文藝批判的政策責任。

由於毛澤東打倒彭眞心意已決，5 月 4 月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全力批判彭眞、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彭眞自知大勢已去，在會議開始首日，主動向劉少奇、鄧小平表示不再管北京市的工作。事實上，毛澤東已擇定李雪峰接替彭眞出任「京官」，劉、鄧自然同意彭眞的請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9, 下冊, 1912)。另外，約此前後，彭眞也透過電話告知鄧小平辭去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鄧小平表示「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癸君，北京，2015 年 8 月)。

在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在 18 日大講「防止反革命政變」，指控「彭羅陸楊」是「野心家」，並有大段內容專門撻伐彭眞。鄧小平無異於劉少奇、周恩來，皆稱讚林彪的講話並主張印發 (王力 2001, 592)。周恩來在 21 日的會上講話大批「彭羅陸楊」「個人主義極端嚴重」，並指出彭眞更尤爲甚，其「個人主義勝過黨性」。鄧小平在 25 日發言表示：「我們書記處好多書記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沒有察覺，失察的責任主要是我的」；他也呼應林彪、周恩來講話之意，強調必須「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楊勝群主編 2014, 下卷, 1331)。有「文革」揭發資料指稱：鄧小平這一講話中有直接批判彭眞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中央組織部《只爭朝夕》戰鬥隊 1967, 29)。至於鄧小平除了可能對彭眞扣上「極端的個人主義」外，還做了什麼具體而實質的揭發，還需要日後相關史料的面世才能知曉。

1966 年春，北京衛戍區爲了安置一個團，以擔負民兵訓練和維持地方治安任務，曾派人前去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借用住房。此事在 7 月被人翻出並認爲意圖不軌。康生更以此指控賀龍與彭眞「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這時自身處境已屬艱難的鄧小平，不予認同地表示：「我們的軍隊彭眞調不動，我也調不動」(《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3, 1236)。顯示鄧小平對政治基本底線仍有所堅持。

1971 年 9 月，林彪陳屍大漠後，毛澤東決定重新起用鄧小平。值得玩味的是，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澤東接見包括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高級幹部，當提及 1960 年 6 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時，毛澤東詢問鄧小平：「那次你去了吧？」後者回答：「沒有。那次我沒去，彭眞、康老去了。」毛澤東進而表示：「彭眞對於整『蘇修』還是有功的。」並詢問彭眞的近況 (《彭眞傳》編寫組編 2012a, 卷 3, 1267)。毛澤東主導中共對蘇關係的所有重大決策，彭眞代表中共率團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也是由之親自點將成行。毛澤東在十三年後就此詢問鄧小平，不禁令人猜想他是否明知故問？又含有什麼特別的政治用意？

1972 年 8 月 14 日，毛澤東在黨內醞釀讓鄧小平政治「出山」時，強調後者早年在江西被當作「毛派的頭子」挨整、未嘗降敵、立有戰功，以及在反「蘇修」問題上「沒有屈服」。這次毛澤東引導鄧小平回顧彭眞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歷史，並強調「彭眞對於整『蘇修』還是有功的」，是否意在提醒鄧小平：反「蘇修」立功者並非僅

其一人而已？另外，毛澤東緊接問到彭眞的動向，或還懷有一種更深層的意思：鄧小平此番政治東山再起，必須如履薄冰、盡力爲之，不然難保沒有被人取而代之的一日，而彭眞或是一可能的具體選項（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壬君，北京，2016 年 7 月）。

毛澤東突然重提彭眞，鄧小平作如何想？又如何影響其對彭眞可能政治復出的觀感？無法確切猜知。自此直至 1975 年底、1976 年初鄧小平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毛澤東打倒，目前無資料顯示鄧小平曾對彭眞的政治問題和待遇處境發表意見。

捌、結　論

鄧小平和彭眞從 1937 年底、1938 年初結識以來，大致相安無事，而無嚴重紛爭和對立。但是在兩人政治關係平和的表面下，卻隱約存有一種不明言的競爭氛圍。彭眞在 1945 年代中期即進入中央高層核心，比鄧小平還早發跡；但是鄧小平在 1950 年代中期後來居上，一躍成爲彭眞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直屬上級。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工作期間甚爲倚重彭眞，後者也確實爲之分憂解勞。然而，鄧小平親身體驗彭眞的精實幹練之際，多少也可感受後者偶爾流露的權力欲望、心機手段和強悍氣勢。鄧小平亦近身觀察到彭眞有自我的政治看法和思考盤算，對於毛澤東心意的體察、領悟和緊跟，有時自己還不如之。另外，毛澤東也不無刻意製造、一再操弄鄧小平對彭眞的競爭意識：1965 年到「文革」爆發前夕，毛澤東對彭眞青睞的程度，一度高過鄧小平，更似有取代之勢；鄧小平在「文革」中剛復出，毛澤東又使計提及彭眞以對其示警。

鄧小平歷經如上的共事經驗和政治過程後，是否會對彭眞心生政治疑慮和芥蒂？是否有可能進而影響 1979 年以後彭眞重返政壇以後的政治任命？受限於文章的篇幅，鄧小平和彭眞在「改革開放」階段具體的政治互動、政策異同和關係演變，需要留待另外的專文討論。

*　　*　　*

（收件：106 年 7 月 30 日，接受：107 年 1 月 17 日）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g Zhen and Deng Xiaoping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1938~1976)

Yen-Lin 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Peng Zhen and Deng Xiaoping had been two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the erup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both acted as Party Chairman Mao Zedong's main political assistants and followed his lead carefully.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political figures has received little research attention in Chinese-language publications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and Western academic works. In fact, there has been no detailed empirical study related to the issue. Based on newly available materials and recent interview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Peng devotedly assisted Mao in implementing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40s. Consequently, he was not only elected to be a Politburo member, but was also nominated by Mao to be the alternate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the de facto supreme policy-making organ of the Party at the time. Much later than Peng, Deng's political status soared after making a great military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ao Gang-Rao Shushi Incident, becoming a political rising star in the mid-1950s. In 1956,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Mao, Deng was appoint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also

the General Secretary in charge of leading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and handling the daily works of the Party center. 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Peng was appointed the second-ranking leader of the Central Secretariat, a position he was entrusted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by Deng, and exerted substantial power and influence over Chinese politics.

Prior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ng and Deng cooperated well in implementing central policies and running the Party-state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Howev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in contrast to Deng who drew criticism from Mao due to the economic adjustments in 1962, Peng and Mao had similar views over the issues involved. As a result, Mao trusted him even further. Furthermore, after Mao criticized Deng in late 1964 for trying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kingdom" politically, Peng continued to be in Mao's good graces until spring 1966 when the Supreme Leader was about to laun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fore and eve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seemed to intentionally manipulate the unspoken competition between Peng and Deng to serve hi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Keywords: Peng Zhen, Deng Xiaoping, Central Secretaria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參 考 文 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2002，《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 7 冊，北京。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shigao bianweihui ed. 2002. *Deng Liqun guoshi jiangtanlu*, Vol. 7. [*Record of Deng Liqun's Lectures on National Historty*, Vol. 7]. Beijing.

《彭眞傳》編寫組編，2012a，《彭眞傳》，卷 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ed. 2012a. *Peng Zhen zhuan*. Vol. 1, 3. [*Biography of Peng Zhen*, Vol. 1,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彭眞傳》編寫組編，2012b，《彭眞年譜》，卷 3、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Peng Zhen zhuan bianxiezu ed. 2012b. *Peng Zhen nianpu*, Vol. 3, 4. [*Chronicle of Peng Zhen's Life*, Vol. 3, 4].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人民日報，1962，〈團結奮鬥爭取新勝利〉，4 月 17 日。Renmin Ribao. 1962. "Tuanjie fendou zhengqu xin shengli" [Unite and Strive Together for New Victory]. April 17.

中央組織部《只爭朝夕》戰鬥隊，1967，〈鄧小平與安子文的黑關係一百條〉，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資料組編印，《把鄧小平批倒鬥臭》：18-30，北京。Zhongyang zuzhibu zhizheng chaoxi zhandoudui. 1967. "Deng Xiaoping yu An Ziwen de heiguanxi yibai tiao" [A Hundred Cases of the Black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g Xiaoping and An Ziwen]. In "*Ba Deng Xiaoping pidao douchou*" [*Fiercely Denouncing and Struggling against Deng Xiaoping*], eds. Beijing dizhi xueyuan geming weiyuanhui, hongdaihui Beijing dizhi xueyuan dongfanghong gongshe ziliaozu. Beijing.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3，《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2003. *Mao Zedong zhuan（1949~1976）*. [*Biography of Mao Zedong（1949~1976）*].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2009. *Deng Xiaoping nianpu（1904-1974）*, Vol. 2, 3. [*Chronicle of Deng Xiaoping's Life（1904~1974）*, Vol. 2, 3].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 2、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 2013. *Mao Zedong nianpu（1949~1976）*, Vol. 2, 5. [*Chronicle of Mao Zedong's Life（1949~1976）*, Vol. 2, 5].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黨史研究室，2004，〈緬懷偉人牢記教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鄧小平的歷史足跡》：85-94，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Zhonggong Neimenggu zizhiquwei dangshi yanjiushi. 2004. "Mianhuai weiren laoji jiaohui" [Commemorate Great Man and Remember His Instructions]. In "D*eng Xiaoping de lishi zuji*" [*The Traces of Deng Xiaoping in History*], ed.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shi

yanjiushi keyan guanlibu. Beijing: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中共北京市委，1955，〈一九五五年歡迎胡志明同志遊園晚會參加人員名單〉，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1-006-01054。Zhonggong Beijing shiwei. 1955. *Yijiu wuwu nian huanying Hu Zhiming tongzhi youyuan wanhui cenjia renyuan mingdan*. [*The Attendance List of the Officials to the Welcome Party for Comrade Ho Chiminh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Park in 1955*.] Document no. 001-006-01054.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毛毛，2000，《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Mao, Mao. 2000. *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 "Wenge" suiyue*. [*My Father Deng Xiao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Taipei: Shuangda lvyou chubanshe.

毛澤東，1999，〈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1956 年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 7 卷：110-113，北京：人民出版社。Mao, Ze-dong. 1999. "Guanyu zhonggong zhongyang she fuzhuxi he zongshuji de wenti（1956 nian 9 yue 13 ri）" [The Issue Regarding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s of Vice Chairman and General Secretary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 on September 13, 1956)]. In "*Mao Zedong wenji*, Vol. 7" [*Col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7], ed.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王力，2001，《王力反思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Wang, Li. 2001. *Wang Li fansilu*, Vol. 2. [*Reflections of Wang Li*, Vol. 2]. Hong Kong: Beixing chubanshe.

何方，2005，《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He, Fang. 2005. *Dangshi biji: Cong zunyi huiyi dao yanan zhengfeng*, Vol. 2. [*Notes on Party History: From the Zunyi Conference to Yan'an Rectification*, Vol. 2]. Hong Kong: Liwen chubanshe.

宋毅軍，2014，〈鄧小平和彭眞在七千人大會前後〉，《黨史博采》，(8)：21-24。Song, Yi-jun. 2014. "Deng Xiaoping he Peng Zhen zai qiqianren dahui qianhou" [Deng Xiaoping and Peng Zhen before and after the Seven Thousand Cadre Conference].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8): 21-24.

李正中編，2015，《文革史料叢刊第一輯》，第 4 冊，台北：蘭臺出版社。Li, Zheng-zhong. 2015. *Wenge shiliao congkan diyiji*, Vol. 4.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Materials*, Vol. 4]. Taipei: Lantai chubanshe.

李志綏，1994，《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Li, Zhi-sui. 1994. *Mao Zedong siren yisheng huiyilu*. [*The Memoirs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hysician*].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2002，《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眞》，北京：群衆出版社。Li, Hai-wen, and Yan-ling Wang eds. 2002. *Shiji duihua: yi xinzhongguo fazhi dianjiren Peng Zhen*. [*A Century's Dialogue: In Remembrance of Peng Zhen, the Founder of Law in New China*]. Beijing: Qunzhong chubanshe.

李新，2008，《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Li, Xin. 2008. *Liushi de suiyue: Li Xin huiyilu*. [*The Past Time: Memoirs of Li Xin*].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紅代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東方紅》編輯部，1967，〈羅瑞卿的罪惡歷史〉，《東方紅》，第 51 期，9 月 16 日，第 2 版。Hongdaihui zhongguo kexue jishu daxue dongfanghong bianjibu. 1967. "Luo Ruiqing de zuie lishi" [The Most Odious History of Luo Ruiqing]. *East Is Red* 51: 2.

高文謙，2003，《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Gao, Wen-qian. 2003. *Wannian Zhou Enlai*. [*Zhou Enlai's Later Years*]. Hong Kong: Mirror Books.

國家體委系統革命造反聯絡總部，1967，〈三反分子賀龍反黨罪行錄〉，《體育前哨》，第 8 期，6 月 22 日，第 4 版。Guojia tiwei xitong geming zaofan lianluo zongbu. 1967. "Sanfan fenzi He Long fandang zuixinglu" [Record of Anti-Party Crimes of Three-anti Element He Long]. *Sport Outposts* 8: 4.

張素華，200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Zhang, Su-hua. 2006. *Bianju: qiqianren dahui shimo*. [*The Turning Point: The Seven Thousand Cadre Conference*]. Beijing: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張培森整理，2009，〈楊尚昆 1986 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3)：29-36。Zhang, Pei-sen (recorded). 2009. "Yang Shangkun 1986 nian tan Zhang Wentian yu Mao Zedong" [Yang Shangkun Talked about Zhang Wentian and Mao Zedong in 1986]. *Yan-Huang Historical Review* (3): 29-36.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宣傳組，1967，〈看！賀龍的黑手伸得多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北京。Qinghua daxue jinggangshan bingtuan xuanchuanzu. 1967. "Kan! He Long de heishou shen de duo chang" [Look! He Long Reached out His Long Black Hands]. In "*Dadao fangeming xiuzheng zhuyi fenzi He Long*" [*Strike Down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He Long*]. Beijing.

彭眞，1962，〈彭眞同志在市第四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 年 6 月 19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001-006-02077。Peng, Zhen. 1962. *Peng Zhen tongzhi zai shi disijie yici renmin daibiao dahui shang de jianghua jilu（1962 nian 6 yue 19 ri）*. [*Comrade Peng Zhen's Speech in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urth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on 19 June, 1962*.] Document no. 001-006-02077.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楊勝群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4，《鄧小平傳（1904~1974）》，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Yang, Sheng-qun, and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eds. 2014. *Deng Xiaoping zhuan（1904~1974）*, Vol. 1, 2. [*Biography of Deng Xiaoping（1904~1974）*, Vol. 1, 2].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董邊、鐔德山、曾自編，1990，《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Dong, Bian, De-shan Tan, and Zi Zeng eds. 1990. *Mao Zedong he tade mishu Tian*

Jia-ying. [*Mao Zedong and His Secretary Tian Jiaying*].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劉政、張春生，2013，〈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眞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51）：136-159。Liu, Zheng, and Chun-sheng Zhang. 2013. "Cong lishi de jige zhongda guanjie kan Peng Zhen he Mao Zedong de guanxi" [Obser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g Zhen and Mao Zedong at Several Critical Junctures in History]. *Leader*（51）: 136-159.

鄧力群，2012，〈關於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3）：11-17。Deng, Li-qun. 2012. "Guanyu xilou huiyi de huiyi" [Memory Regarding Xilou Conference]. *Hundred Year Tide*（3）: 11-17.

鄧力群，2015，《鄧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Li-qun. 2015. *Deng Liqun zishu（1915~1974）*. [*Deng Liqun's Autobiography（1915~1974）*].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鄧小平，1994，〈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卷）》：318-321，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Xiao-ping. 1994. "Kefu dangqian kunnan de banfa" [Solutions for Overcoming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Deng Xiaoping wenxuan*（Vol. 1）"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Vol. 1）], ed. Xiao-ping Deng.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鄧小平，2014，〈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農業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146-147，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Xiao-ping. 2014. "Nayizhong fangfa youli yu huifu nongye shengchan, jiuyong na yi zhong fangfa" [Just Adopt the Most Useful Approach to Resto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Deng Xiaoping wenji（1949~1974 nian）*, Vol. 3" [*Col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1949~1974）*, Vol. 3], ed.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薄一波，1997，《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Bo, Yi-bo. 1997. *Ruogan zhongda juece yu shijian de huigu,* revised edition, Vol. 2. [*Reflections on Certain Major Decisions and Events*, Vol. 2].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鍾延麟，2010，〈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爲〉，《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4）：521-562。Chung, Yen-lin. 2010. "Deng Xiaoping zai 'Gao Rao shijian' zhong zhi juese yu zuowei"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ao Gang-Rao Shushi Inciden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2（4）: 521-562.

鍾延麟，2013，《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Chung, Yen-lin. 2013. *Wenge qian de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de "fushuai"（1956~1966）*. [*Deng Xiaop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s*

"Vice Marshal"（1956-1966）].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鍾延麟，2014a，〈彭眞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爲〉，《中國大陸研究》，57（1）：97-125。Chung, Yen-lin. 2014a. "Peng Zhen zai 1959 nian zhonggong 'fanyouqing' yundong zhong de juese he zuowei" [Peng Zhen'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of 1959].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7（1）: 97-125.

鍾延麟，2014b，〈彭眞在 1957 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爲〉，《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2）：247-292。Chung, Yen-lin. 2014b. "Peng Zhen zai 1957 nian zhengfeng, 'fanyoupai' yundong zhong de juese yu zuowei"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Rectification and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of 1957].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6（2）: 247-292.

鍾延麟，2015，〈「文革」前彭眞對中共首都的管理：政治方針、領導方式和幹部政策〉，《中國大陸研究》，58（3）：123-153。Chung, Yen-lin. 2015. "'Wenge' qian Peng Zhen dui zhonggong shoudu de guanli: zhengzhi fangzhen, lingdao fangshi he ganbu zhengce" [Peng Zhen and the PRC's Capital Governance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olitical Principles, Leadership Style and Cadre Polic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8（3）: 123-153.

鍾延麟，2016a，〈彭眞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1)：99-151。Chung, Yen-lin. 2016a. "Peng Zhen he zhonggong dongbeiju zhenglun: jianlun qi yu Gao Gang, Lin Biao, Chen Yun zhi guanxi（1945~1997）" [Peng Zhen's Role in the Disputes of the Northeast Bureau of the CCP and His Subsequent Relationships with Gao Gang, Lin Biao, and Chen Yun, 1945~1997].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91）: 99-151.

鍾延麟，2016b，〈彭眞在「文革」前中共對外關係中的角色和活動（1949~1966）〉，《中國大陸研究》，59（2）：67-101。Chung, Yen-lin. 2016b. "Peng Zhen zai 'wenge' qian zhonggong duiwai guanxi zhong de juese he huodong" [Peng Zhen'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49~1966）].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9（2）: 67-101.

Chung, Yen-lin. 2013. "The CEO of the Utopian Project: Deng Xiaoping'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69）: 154-173.

Chung, Yen-lin. 2015.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74）: 129-143.

Huang, Jing. 2000.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tter, Pitman B. 2003.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